2013 年 2 月 清史研究 Feb. 2013
第 1 期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No. 1

学术专论

论十九世纪上半期理学在知识界的状况*

张瑞龙

[摘要] 本文在大力发掘理学书籍出版、销售等资料的基础上，选取适当历史时段，对不同时期理学书籍的出版状况做数据统计，并从学者的意见与观感、国家政策的调整与实施以及理学书籍的刊刻与撰述等三个层面，考察理学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知识界的状况。认为: 嘉庆朝前期理学处于衰微至极的尴尬境地，这种状态引起少数有识之士的忧虑和关注，因而出现各种倡导理学的意见; 嘉庆十八年发生的天理教事件，不但导致清廷在文化政策方面作出重大调整，也使得民间那些倡导理学的意见成为官方政策和行为; 在朝野的共同努力下，理学在嘉庆朝后期尤其是道光朝逐渐恢复生机，并在理学书籍的刊刻与撰述层面有明确体现。道咸以降理学的兴起，正是这一趋势持续发展的结果。

[关键词] 十九世纪上半期 理学 图书刊刻 汉宋之争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8587 (2013) -01 -0033 -11

A Study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First Half of 19th Century

Based on the material for the publication and sell of books of Neo-Confucianism, this article makes statistics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very sort of book during various periods. Moreover, the author investigates the situ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among the intelligentsia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19th century in terms of the opinions of scholars, the adjustment of imperial policy, and the print and writing of books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ign of Jiaqing, Neo-Confucianism had declined and few scholars were extremely concerned, although various proposals of uphold of this very school could be heard. The Incident of Tianli Sect in the eighteenth year of the reign of Jiaqing forced the Qing to make significant adjustment to its cultural policy, and made Neo-Confucianism part of governmental policy. Neo-Confucianism began to revitalize since the late Jiaqing, especially during the Daoguang reign in terms of the print and writing of books. The ascending of Neo-Confucianism since the period of Daoguang and Xianfeng was the result of this trend.

关于清中叶汉学考据兴盛时，理学（或宋学）在知识界的地位和状况，学界存在截然相反的判断。如萧一山就认为即使在汉学考据鼎盛时期，知晓汉学考据大师及其著述者，也只是“中流以上”的少数人而已。[①]言下之意，理学在这一时期仍踞主导地位，汉学考据只是少数精英间流行的学问。与此相反，余英时先生则称“乾嘉的经学考证以‘汉学’为标榜，当时几乎有‘定于一尊’的趋势”，宋学或理学遭受排击，“下及嘉庆时期，情况依然未变”。[②]由于其判断的主要依据是《啸亭杂录》中北京书肆买不到理学书的记载，因而也遭到一些学者质疑。如葛兆光教授就说:“书店对程朱的书束之高阁，可能正是因为这种书太多，已经成为人手一册的经典和教科书的时候，书店就未必特别关注经营这类书。”[③]

[收稿日期] 2012 -07 -20
[作者简介] 张瑞龙（1979—），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讲师; 北京 100872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不过，若考虑到图书的自然损耗及新增生童持续产生的需求，则葛教授的这一质疑仍有商榷之处。

然而，这一看似简单的判断，却对深入探究清代学术与思想史上的诸多问题，如汉学考据鼎盛时期，知识界的反理学之风是民间行为还是官方授意，其规模和范围究竟有多大，是少数人的行为还是蔓延知识界的潮流，进而学界颇为关注的戴震及其后学反对程朱理学，提出“以礼代理”等，是否具有所谓思想解放的“启蒙”意义，[④]以及清代学术从乾嘉汉学考据到道咸以降理学兴起间的演变等，都有重要意义。问题在于，我们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对这一时期理学在知识界的一般状况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和把握?

近年西方关于书籍史的讨论，给我们很大启发，即可从书籍的出版、流通与阅读等角度考察此问题。[⑤]具体到清中叶理学，则是理学书籍的刊印、销售与士人对理学在知识界状况的评论和观感等。上引余英时先生的研究，可谓在此方面先发其覆，但由于论题所限，在史料发掘及具体论述等方面仅引其端。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对理学书籍出版、销售等资料做较大规模扩充的基础上，选取适当历史时段，对不同时期理学书籍的出版状况做数据统计，进而从学者的意见与观感、国家政策的调整与实施以及理学书籍的刊刻与撰述等三个层面，考察理学在清中叶知识界的状况。[⑥]时段上，则以十九世纪上半期亦即传统所谓嘉庆、道光两朝为主，这也是学界讨论清中叶汉宋之争时关注最多的两部著作——《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产生的时期。嘉庆朝通常被认为是汉学极盛、理学极衰的时期，但学界对这一时期理学状况的讨论，尚多为印象式描述，故本文先就此加以讨论。

一、嘉庆朝前期理学在知识界的衰微状况

由于乾隆中后期纂修《四库全书》等奖掖汉学考据措施的实施，以及乾隆晚年以帝王之尊亲撰考证性文字等个人行为的引导，嘉庆前期汉学考据已然成为知识界的“显学”。[⑦]与此相反，理学则因乾隆帝于二十一年（1756）仲春经筵后多次有意贬损及知识界汉学考据之风的盛行，到嘉庆初年已处于极为衰微的境地。

首先，从理学书籍的销售状况看，当时一些常见理学书在南北书肆都很难找到。嘉庆六年（1801）春夏之际，朝鲜使臣柳得恭于赴京次日拜访纪昀，请其帮忙在京购买《朱子语类》及薛瑄《读书录》等理学书，纪昀便称:

> 此皆通行之书，而迩来风纪趋《尔雅》、《说文》一派，此等书遂为坊间所无。[⑧]

同样，嘉庆间昭梿在北京书肆购求此类理学书籍时，也遇到类似情况，他说:

> 余尝购求薛文清《读书记》（又作《读书录》）及胡居仁《居业录》诸书于书坊中，贾者云“近二十余年，坊中久不贮此种书，恐其无人市易，徒伤赀本耳!”[⑨]

不但京师如此，甚至在有“人文渊薮”之称的江南，理学书籍亦处于相似境地。所不同的是，当时江南并非没有这类书籍，只是因长期无人问津，被当作废纸卖掉。嘉庆初年，居于苏州府震泽县的张海珊购买理学书籍的经历，便是这种状况的最好说明。张氏自言“家无书籍，稍稍从贾客购取”，与其他书籍相比，价格差却是:

> 宋人著作极廉，而时贤解经之书往往兼金不能得。自某年迄某年，约所收数百卷，皆贾人之以为陈年故纸，而无人过问者也。[⑩]

这种“宋人著作极廉”，而“时贤解经之书”即汉学考据著作昂贵——“往往兼金不能得”的情况，还可从下面的例子得到证明。嘉庆四年（1799），段玉裁在致友人信中评论王念孙刚刊行的《广雅疏证》销售价格，便称“发价甚昂”。[⑪]高昂的销售价格确能从某种程度反映这一学术的“前沿”与“时尚”程度。而次年段氏之子因参加江南乡试费用不敷，带其所著《周礼汉读考》二十本赴金陵售卖，又颇能透露出汉学考据著作在参加科考士子中的受欢迎程度。[⑫]理学书的销售状况则与此恰恰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相反，与张海珊购买理学书的情况相似，嘉庆元年前后，江南一位以舂米为生却好读书的佣工，很长一段时期以每年工价所得，悉以购书。据说其选购标准是“无所择”，但所得之书却“大约理学居多”。[⑬]考虑到这位佣工的实际收入与其扣除基本生活所需后的购买力，以及只要是书便可的选购态度，价格低廉的滞销书往往成为首选。在此情况下，所购之书竟以理学居多，则理学在知识界的境遇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即使谋刻这些常见的理学书，亦非易事。嘉庆十九年，钟山书院山长姚鼐因劝诸生读《四书或问》、《朱子语类》等理学书，但“坊间书贾至无此书”，便欲谋诸江苏学政陈希曾，希望在其按临时“劝其镌版颁学”，却因陈氏任内升迁离职而作罢。[⑭]

书籍的销售和刊印状况，确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其时知识界的学术风气。对像北京这样的帝国文化中心，竟连处当朝学术正统地位的理学常见书都难找到，柳得恭感叹说“程朱之学不讲，似已久矣。中国学术之如此，良可叹也。”[⑮]柳氏是域外人士，“异域之眼”有时可能只是管中窥豹，但其相对较为客观、冷静的观察，则颇能道出实情。

与南北书肆极少有售卖理学书者相应的，则是读理学书之人亦极少。对此，焦循有这样的观察，说“近日学者不好宋儒书，故不甚宝惜。”并提到其于嘉庆四年看到有售卖康熙间张伯行所刊《正谊堂四书》的书板，且“价亦甚廉”，因“亟趣友人买得之”。[⑯]同样，嘉庆朝前期成学的汪喜孙，曾自言其“生平于程、朱书，用力甚浅”，平日所读理学书，则仅是“《论》、《孟》、《大学》、《中庸》注”而已。[⑰]如果说，这只是汪氏个人较为独特的学术经历，那么，陈用光在谈到其二十余年间师友交游及游宦所历遇到的情况，便颇能说明这一现象的普遍性，他说“廿余年间，人多称汉儒，无及宋儒者。”[⑱]考陈氏此语作于嘉庆二十一年前后，则此“廿余年间”正处嘉庆前二十年。此外，嘉庆十九、二十年前后，昭梿在所著《啸亭杂录》中，也特别提到“近日士大夫皆不尚友宋儒”的学术风气。与此同时，还有理学人才的缺乏。据昭梿观察，当时从政者中颇乏理学人才，甚至连素有“文士渊薮”之称的江浙，亦不例外。[⑲]

此外，在学术地位方面，程朱理学的道统地位，也因汉学考据家的明争暗夺变得岌岌可危。早在乾隆中期，随着汉学考据在知识界的蔓延及官方的刻意提倡，汉学考据的代表人物戴震便流露出其争夺程朱理学道统地位的野心。据曾与其几次晤谈的章学诚称，戴氏“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诋以妄作。且云:‘自戴氏出，而朱子侥幸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运亦当渐替。’”[⑳]戴震这些贬诋朱子的言论，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章学诚就曾听到“表表于人望”的“通人”说“异日戴氏学昌，斥朱子如拉朽。”甚至更有“著书辟宋理学，以谓六经、《论语》无‘理’字”者。[㉑]这种风气到嘉庆初年更有增无减，嘉庆二年章学诚致朱锡庚信中，再次谈到戴震贬诋朱子对知识界后起之秀的影响，说“至今休、歙之间，少年英俊不骂程朱不得谓之通人。”[㉒]姚鼐也注意到戴震对程朱理学“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嘉庆十二年致函给陈用光称“戴东原言考证岂不佳，而欲言义理，以夺洛闽之席，可谓愚妄，不自量之甚矣。”[㉓]

剥极而复，当一种学术衰微至极时，往往会引起反弹。的确，理学在嘉庆初年知识界这种状况，便引起知识界少数有识之士的忧虑和关注。尽管这种声音早在汉学考据尚未成为知识界的主流时就已出现，但其逐渐成为一种“意见气候”，则是在嘉庆朝。巧合的是，嘉庆朝又是民变、教案频繁发生的时期。嘉庆十八年（1813）发生的天理教事件促使清廷在文化政策方面作出重大调整，由此前的崇尚汉学开始转而提倡理学。[㉔]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理学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知识界，也从衰微至极的境地逐渐恢复生机。

二、十九世纪上半期关于倡导理学的学者意见与观感

学者的意见与观感有时尽管只是一种个人观点的表达，未必具有特别的代表性，但当身处不同地域的不同学者几乎在同一时期发表类似的意见，则往往成为知识界出现某种学术趋向的表征。而当这些相似的意见，却来自具有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不同学术倾向的人时，便更具代表性。十九世纪上半期知识界出现的倡导理学意见，便是如此——它们分别来自汉学家内部和汉学阵营外部一贯倡导理学的理学者。

在汉学内部，关注现实的汉学家因反思汉学极盛产生的流弊，转而提倡理学，试图有所挽救。嘉庆十三年，74 岁的段玉裁致同为汉学巨擘的王念孙信中，便称“今日之弊，在不尚品行政事，而尚剿说汉学”，意欲共同提倡理学，云“然则理学不可不讲也，执事其有意乎?”㉕次年，段氏又对其时知识界盛行的贬抑理学之风，称其为“吾辈所当大为之防”者。㉖并对朱子《小学》，推许备至，称“二千年贤圣之可法者，胥于是乎在”，云“汉人之小学，一艺也; 朱子之小学，蒙养之全功也”，言“朱子之教童蒙者，本末兼赅，未尝异孔子教弟子之法”，表示要“敬谨翻阅，绎其旨趣，以省平生之过，以求晚节末路之自全”。㉗而当嘉庆十八年秋，震惊朝野的天理教事件发生后，这一趋势便更为明显。次年九月，段氏致函福建学者陈寿祺，再次申言:

> 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过也。

称“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而况所谓汉学者如同画饼乎?”力劝陈氏“与诸生讲求正学气节，以培真才，以翼气运”。㉘被后人誉为“汉学护法”的阮元，这时在致陈氏信中，也说“近之言汉学者，知宋人虚妄之病，而于圣贤修身立行之大节略而不谈，以遂其不矜细行，乃害于其心其事。”㉙反思汉学盛行产生的流弊，主张提倡理学。且在此前的嘉庆三年，阮氏因鉴于这种风气，作《曾子十篇注释》，试图有所挽救，称“近人考证经史小学之书则愈精，发明圣贤言行之书则甚少，否则专以攻驳程朱为事，于颜、曾纯笃之学未之深究。兹注释五卷，不敢存昔人门户之见，而实以济近时流派之偏也。”㉚

在汉学外部，理学家则本其一贯立场，一方面抨击汉学盛行所导致的理学衰微，另一方面积极提倡理学。嘉庆十九年，姚鼐致函友人批评说“近世所重只考证、词章之事，无有精求义理者，言尚远之，而况行乎?”因而在其主持的钟山书院，“劝诸生看朱子《或问》、《语类》”。㉛此前，姚氏也曾号召诸生“一遵程、朱之法，以是为学，毋迁异说。”㉜嘉庆十八年，姚氏致函陈用光，亦劝其用功程朱理学，云“读程朱之书，用功之劳同，而所得者大且多也。”㉝同样，张海珊在给友人信中，亦言《春秋》难治，建议“且置《春秋》，而从事于《近思》、《四子》”，劝读其理学书。㉞而在与另一位友人讨论“为学之道”的信中，则称“舍朱子无从而学”。㉟嘉庆十五年后，夏銮在任贵池县教谕及徽州府学训导的 19 年间，不但本人“专嗜程朱之书，语默动静，造次必于儒者”，且“训士子必以笃信朱子，躬行《小学》为宗”。㊱道光元年前后，董桂敷任豫章书院山长，亦以程朱之学训诸生，言“若乃穷义理之精微，抒身心之实得，则程朱之学，体用兼赅，其遗书无可复议。”㊲张履则指导友人读理学书的先后次第，云“足下既从事薛、胡，此后宜看《近思录》，渐及五子全书，以上溯六经，若兼看陆王，则必以景逸、念台继之，以二子学王而能救其失者也。”㊳

不仅如此，他们还试图说动主持一省学风的学政，来提倡理学。科举考试是士子登进首途，而获取诸生资格又是博取科第的首要之务，由于地方学政掌握诸生黜录之权，这种通过地方学政来提倡理学的做法，无疑可以保证录取者多是尊崇理学之人，且在年复一年的获取和保持诸生资格的考试中加强这一学术倾向。这无疑是提倡理学最切实有效的方式。嘉庆十八年冬，姚鼐给新任江苏学政陈希曾信中，谈到“士风之日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士人不读理学书，建议陈氏衡文取士，“要必以程朱之学为归宿之地”。㊴同时，他还因金陵书肆无朱熹《四书或问》、《朱子语类》等书，意欲在陈氏按临考试时，“劝其镌版颁学”。尽管后因陈氏升调未果，但他还特为此致函在京弟子陈用光，想通过出任学政的友人，助成此事，云“若石士在京中，遇相知出为学政者，勖以此事或尚可也。”㊵

道光间，夏炯亦从地方学政的角度着眼，强调其对提倡理学的重要性，云“学政有学校重任，故以端本风化，造就人才为上，衡文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次之。”[41]而所谓“端本风化，造就人才”，则在能否讲明理学、剔除汉学考据的琐碎支离之弊，号召有地方教化之责者，“举所谓考据训诂之支离，一扫而空，以归本于濂洛关闽有体有用之学”。[42]

最后，通过乡会试提倡理学。方式则是劝说提倡理学的人积极争取乡、会试考官之职，在更高级别的科举考试中掌握士子登进的生杀大权，在这种级别的考试中提倡理学，其影响无疑更大，也更为奏效。以姚鼐为例，在嘉庆十九年甲戌科会试前，他便致函在京的弟子、亲友努力争取考官之职，如致函时任江南道监察御史的弟子陈用光，说“春闱或当分校，文风衰极，此士习人心之征也，岂不可忧，能使反正，良为佳耳。”[43]给在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任的弟子鲍桂星信中言“今春望双五总裁会闱，文体之坏甚矣，能反之以正，乃士流之所望也。”[44]致函在翰林院任职的从侄孙姚元之称“会闱近，若得分校，佳事也。”[45]当他得知陈用光获得会试同考官之职后，即致函陈氏言“为学不可执汉、宋疆域之见，但须择善而从”。[46]而揆诸其一贯学术立场，则此处所择之“善”，无疑是宋学（理学）而非汉学。

这些身处不同地域的不同学者在同一时期提出的倡导理学的意见，便成为当时知识界的一种“意见气候”，而那些来自汉学家内部倡导理学的声音，更表明这一发展趋势的现实迫切性。至于理学家的意见，他们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将观念付诸实践，而其力图通过地方学政倡导理学的方式，则成为此后官方提倡理学的重要形式。

三、嘉道时期清廷文化政策的调整与实施：由提倡汉学考据转而倡导理学

嘉庆十八年进攻紫禁城的天理教事件发生后，清廷高度关注士习、人心、风俗等方面的问题，并通过各省学政加以救治、改善。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新任湖北学政沈维鐈赴任前请训，帝即谕以“教士以圣贤五伦之道为主，不使入于邪僻”。[47]沈氏因思“四子五经，载道之文也，有宋大儒表章发明，不留余蕴。外是而求道，皆为异端；舍是而言文，皆为俗学”，到任后，即重刊元儒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颁发各地，表示“乐与此邦多士共读洛闽之书，则是编其先路之导也”。[48]且力图使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在全省提倡理学。[49]

如果说这种地方学政刊印理学书籍以提倡理学，仅是某位地方学政因皇帝某句话而出现的个别行为。那么，一年后通过地方学政刊刻宣讲理学书的方式提倡理学，已是国家行为，成为全国各地学政必须遵行的要务。嘉庆二十二年，湖广道监察御史卿祖培上疏，请敕下各省学政以《朱子全书》化导诸生，云：

> 向来学臣按试，未有以其书直切指示，乡曲之士终身或不得一见。乞敕下各省学政，将此书化导诸生，举其要义，往复申论。[50]

疏入，嘉庆帝颁谕通饬遵行，且将讲明朱子之学的对象扩大到各省大小官吏，云：

> 教化为立政之本，以正人心，以厚风俗，非特各省学政，当讲明正学，以端士习，即督抚藩臬，以至道府州县，各有治民之责，皆应随时化导，俾小民迁善远恶，力返淳风。宋儒《朱子全书》固足以阐明经术，而五经及四子书，炳若日星，若在官者，各能身体力行，以为编氓倡率，亦何不可收世道人心之益。[51]

这是嘉庆朝《实录》中仅见的明确要求讲明朱子学的材料，其对朱子著作在全国大规模的重新刊行及理学在知识界再度受到关注，无疑具有重要影响。

是年，姚椿在《重刊近思录后记》中便称其校刊《近思录》，是因“今天子敦重儒术，方表章《朱子全书》，以风厉学者。草茅之士，所以仰承德化，其意指亦未尝不窃取于斯”。[52]次年，四川学政俞恒泽为蜀地重刻朱子《小学》作序，则谈到此谕在各地的执行情况，云“近日我皇上申命天下学校之官，每月召集诸生宣讲《朱子全书》，诚欲使天下之人尽知辟邪说以崇正学，其为化民成俗之意，至深远也。”[53]而其重刻朱子《小学》之举，则是该地执行此谕的结果。

嘉庆后期这一提倡理学的文化政策，在道光朝得以继续施行。道光二年（1822）闰三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月十六日，清廷从御史马步蟾之奏，以理学名臣刘宗周从祀文庙西庑。这是清廷自乾隆二年复元儒吴澄文庙之祀后，八十五年来首次增祀文庙之举，确如礼部诸臣所议 “先儒祔飨庙廷，必其人扶持名教，羽翼圣经，有关学术人心，始能升诸从祀之列，典最巨也。”[54]其从祀对象是理学名臣刘宗周，则显然表明清廷其时刻意提倡理学的鲜明意图。同年，道光帝在新朝首科殿试策论中，又举胡瑗、朱子、真德秀等著名理学家的学说为题，云 “胡瑗教授子弟，咸使适于实用；朱子《白鹿洞学规》，所列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乃圣贤入德之门；真德秀《示学者说》，于学术真伪，剖析谆挚，可以廉顽立懦。今欲使学者处为修士，出为良臣，必知先德行而后文艺，国家乃获收人才之用。多士素所向慕者安在？其述所闻，可以觇器识焉。”[55]其所传达的朝廷崇尚理学倾向，亦明白可见。

此后，道光三年，清廷从通政司参议、原河南学政卢浙之请，以汤斌从祀文庙东庑，因汤氏“所学主于坚苦自持，事事讲求实用，著书立说，深醇笃实，中正和平，洵能倡明正学，远契心传”。[56]卢氏此举被当时人称为“系学术之大者”，因此奏使“斌所私淑之吕坤，所师事之孙奇逢，后数年皆为廷臣奏请从祀”。[57]五年，从在籍翰林院编修陈寿祺、闽浙总督赵慎畛之请，以明臣黄道周“亮节孤忠，早树楷模于史册，正谊明道，复标圭臬于儒林”，从祀东庑。[58]六年，从河南巡抚程祖洛等请，以明儒吕坤从祀文庙西庑。[59]八年，从御史张志廉之请以本朝理学名儒孙奇逢“学术中正醇笃，力行孝弟”，“讲学著书，以慎独存诚，阐明道德，实足扶持名教，不愧先儒”，从祀文庙西庑。[60]道光前十年共有五次六人从祀文庙，且五人为理学名儒（臣），与乾嘉八十余年间无一人从祀相比，更可见其时清廷提倡理学之迫切。[61]

此外，奏请以理学名儒崇祀国家祀典未获允准的，还有道光三年礼部驳福建巡抚叶世倬请以宋儒李侗立五经博士；九年，道光帝驳礼部已议准的从御史牛鉴之奏以本朝理学家李颙从祀文庙等。[62]尽管未获允准，但也反映出其时在清廷尊崇理学等举措的影响下，各地官员及知识界倡导理学的努力和风气。

在清廷提倡理学政策的影响下，各省学政按试各地，录取生员时，理学也成为倡导、表彰的对象。以福建为例，道光三年，福建学政沈维鐈为《凤池书院课艺》作序，即提倡以宋五子之书为归宿的学问，称 “多士诚取朱子读书法而奉为准绳，其于文也，思过半矣。”批评“以文字语言为功夫，声名利禄为归趣”者，言其“失皮而露质，被褐而丧珠，欲求一言之合于道，岂可得哉?”[63]次年，沈氏又遴选福建士子岁试文之优者，“刊板以式多士”，提倡朱子学，并申述国家以程朱理学取士的意图，云 “国家以四书文取士，以朱子《章句集注》为宗，所以一有司之绳尺而端学者之趣向，非漫然也。”批评汉学考据“训诂名物，专意考订，甚且党枯雠朽，聚讼纷呶”，“不切于身心之务”。[64]道光十年，福建学政陈用光访得宋儒陈石堂遗书，因石堂曾作《勉学诗》勖其邦人，乃以“勉学”题福宁试院匾额，并将《勉学诗》刻石，并撰《勉学堂记》，“以勖为宋学者”，言 “愿天下士皆勉为先生之学，庶几不愧说约自得之旨，不独为闽士言之，而于闽士尤三致意云。”[65]

在传统社会，科举考试的影响范围，下起童生、生监，上至举人、进士，笼罩了博取功名的各级士子，因而朝廷文化政策的转变对天下士人无疑都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上述各省学政训课、取士等方面学术取向的变化，也体现在知识界学术研究的内容以及图书刊刻种类的变化等各方面。

四、十九世纪上半期理学书籍的刊刻与撰述

与嘉庆前期理学著作难觅或几被视为废纸的尴尬境况相比，到嘉庆后期尤其是道光朝，因受清廷提倡理学政策的影响，理学书籍不但重新受到关注，官方和民间亦致力于理学书籍的刊刻。

首先，各地学政刊刻理学书籍。如嘉庆十八至十九年，江西学政王鼎与江西巡抚先福、布政使袁秉直等共同出资刊刻江永《近思录集注》，且“按学大小而周布之”。[66]嘉庆二十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三年，湖北学政沈维鐈校刊罗钦顺《困知记》、祝洤《淑艾录》、汪烜《读近思录》、《儒先晤语》等理学书。[67]二十二至二十四年，贺长龄任山西学政，也谋刻《近思录集注》、《高子讲义》、《松阳讲义》等理学书，并因此与他省学政互通声气，如嘉庆二十二年董桂敷致函魏源商量贺氏所刻诸书时，就谈及湖北学政沈氏与其商酌刻理学书事，云"前者，沈鼎甫学使行时亦见商刻书，已与酌定《困知记》、《读困知记》合刻，借有底本带去矣。"[68]又如道光元年，贵州学政戚人镜在仅有数月的任职期间，不但向士子"讲明义利，示以体用"，还刊朱子《小学》、刘宗周《人谱》等理学书，"使所知趋向"。[69]道光八至十年，陈用光在福建学政任，重新订正、刊刻程氏《读书分年日程》，又刻陆陇其《一隅集》以训士，并"附录顾亭林《日知录》二则，以使学者知所戒；录韩理堂《会文约》一首，以使学者知所慕"。[70]同时还将访得的宋儒陈石堂遗书刊刻行世。[71]再如，沈维鐈在道光十二年至十七年两任安徽学政的六年间，于十四年刊刻《张杨园先生年谱》、陈瑚《圣学入门书》，十七年校刊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前集》二十二卷、《后集》十三卷等。[72]十九年，祁寯藻在江苏学政任，刊朱子《小学》。[73]二十九年，龙启瑞任湖北学政，亦重刊朱子《小学》，并张贴告示，称生童面试时如能"默写《小学》数端，或作《小学论》一通，必加优奖"，[74]同时还谋刻《近思录》等。[75]

在民间，理学著作的刊刻情况，也大有改观。如嘉庆十九年姚江学者重刊明末理学名儒刘宗周《人谱》，该刻本传到四川后，即有嘉庆二十一年陆成本的翻刻本。[76]二十二年，屈何炯将其父校勘、订补的《杨园集》朱氏刻板"布诸烟墨"，刷印、销售清初理学家张履祥的各种著作。[77]次年，徐鼎、李文熙等四川官员在蜀地重刻朱子《小学》，而在此前蜀中人士诵习此书者却属"寥寥"。[78]道光元年，莫晋重刊《明儒学案》，言"学贵真修实悟，不外虚实两机，病实者救之以虚，病虚者救之以实。"称此举是使学者"务求自得之真，向身心性命上作印证"，"由诸儒上溯濂、洛、关、闽，以寻源洙、泗"。[79]道光间，洪中翰出资刊行《四书诠义》、《汪双池文集》、《理学逢原》等书以表彰理学。[80]

这时乾嘉之际难觅的薛瑄《读书录》，也因"旧版已漫漶，传世者少"，有了新刻本。道光七年，梁敦怀便将薛瑄《读书录》十一卷、《续录》十二卷重刊，"以广之于世"，称"有志斯道者，幸勿以其近而忽之也"。[81]此外，嘉庆十三年至咸丰三年间，还至少出现了《读书录》及《读书续录》的4种摘录刊本，卷数则自二卷至八卷不等。[82]又如，关中理学名儒李颙的著作，也于嘉庆十五年和道光八年，在甘肃兰州和河南大梁有两个不同的刻本问世。[83]

与此同时，道光前期理学名儒频繁的从祀文庙之举，更直接促成理学书籍的广泛刊刻。如道光二年十月，萧山、山阴、会稽、上虞等地学者集资谋刻刘宗周《刘子全书》，即因刘氏从祀两庑，"闻风兴起者，咸思由文章以考见其道德"。[84]沈复粲不但与同里友人辑录《蕺山刘子全书》四十卷，且以个人之力辑录《刘子书补遗》二十四卷，刊刻行世。[85]不仅如此，刘氏从祀文庙的《上谕》及《礼部议奏原疏》，更成了其著作的销售"广告"，前面提及的嘉庆二十一年蜀地翻刻浙本《人谱》，道光间重印本的卷首便增刻从祀上谕和奏疏。[86]其他如道光六年黄道周遗集的重新编刻，亦与黄氏从祀文庙直接相关。[87]道光七年，开封知府栗毓美等以吕坤上年从祀文庙，竭十余月之力校刻《吕子遗书》。[88]道光十年，衡山县令汪霦原亦以吕氏从祀文庙，重刊吕坤《新吾粹语》，此书与《吕子遗书》卷首均刻有奏请吕坤从祀文庙的奏折、礼部议奏稿及上谕等。而在此前，汪氏已因刘宗周从祀文庙，重刊其《人谱》。[89]

最后，理学著作的辑录和撰述，也渐有起色。与嘉庆初年，学界倡导理学仅是读理学书相比，嘉庆后期及道光间，已有从事辑录和撰述理学著作者。嘉庆二十二年，魏源即因《近思录》注家未有善本，劝董桂敷作《近思录集注》。[90]沈复粲在辑录《蕺山刘子全书》、《刘子书补遗》等书外，还校刊《忠惠文集》，并辑录《王门弟子渊源录》、《忠愍集》等书。[91]道光间，方垧则有"择宋元以来诸儒最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纯粹者，为《学准》一书”的打算。[92]陈沆作《近思录补注》十四卷，并刊行于世。[93]何鸿器、鲍桂星以十数年之力辑录《续近思录》十四卷，并于道光十四年刊刻行世。[94]道光末，黄爽辑元明以来诸儒发明《近思录》者，成《近思录集说》四十卷，并谋刊行。[95]

在理学著作的系统撰述方面，如果说道光四年方东树完成的《汉学商兑》仅是抨击汉学、提倡理学的破旧之举，[96]那么，二十五年唐鉴完成并于同年在京刊行的《国朝学案小识》，则是表彰本朝理学名家，全面提倡理学的立新之作。[97]其间又有道光二年潘世恩纂《正学编》十卷，二十五年何桂珍纂辑《续理学正宗》四卷等。[98]

为了使这一时期理学书籍的刊刻与撰述状况有更直观的呈现，我们将这一时期理学书籍刊刻的状况置于一较长的时段，并与其他时段作对比。选取时段是乾隆三十八年至咸丰二年的八十年（177—1852）间，以恰处中间的嘉庆十八年作为分界点，分为乾隆三十八年至嘉庆十七年（1773—1812）和嘉庆十八年至咸丰二年（1813—1852）两个四十年。所以如此选取和划分，主要是考虑到这样三个标志性的年代或事件:

一、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开馆，这是被誉为康熙中叶以来的汉宋之争，汉学派由野入朝，“完全占胜利”的标志性事件，[99]以此为始统计理学书籍的刊刻状况，可为我们考察汉学鼎盛时期理学在知识界的状况提供直观参考。

二、咸丰二年是太平天国定都南京的前一年，此后战火蔓延，江南文献多遭兵燹之厄，以此为下限，可在最大程度上将这一外在因素的影响忽略，因所统计者皆为此劫后余存。

三、嘉庆十八年是导致清廷在文化政策方面做出重大调整的天理教事件发生之年，巧合的是，这一年也正是这八十年的中间点。这两个前后时长相同且社会外部环境均无重大变化的时期，为我们客观地对比理学书籍的刊印状况提供了可能。

选取的统计样本是孙殿起《贩书偶记（附续编）》和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子部·儒家类·理学之属”所著录的理学书籍。[100]因二书均主要搜罗、著录《四库全书》未收书，尤其是《四库全书》纂修之后陆续出版的各种书籍，且不包括制义等科举用书，故其著录相对而言较为全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颇能反映理学在不同时期知识界的状况。

根据统计，不计各种丛书中所收的理学书籍，前一时期理学书籍的刊刻数量为 14 种 117 卷，后一时期为 42 种 441 卷。以种类论，后者是前者的 3 倍；以卷数论，后者则是前者的 3.77 倍。如果将丛书统计在内，则前者为 19 种 124 卷，后者为 54 种 516 卷，以种类论，后者是前者的 2.8 倍；以卷数论，后者则是前者的 4.16 倍。考虑到上述已讨论的嘉道间官方和民间所刊理学书籍，多在此二书著录范围之外者，则前后两个时期刊刻数量的比率，要远超过以上数字。

不仅如此，这一时长完全相同的两个时段，理学书籍的刊刻数量竟有 3 倍左右的差距，则不但证明后一时段理学书籍的流行和受关注程度，还可与前引乾嘉之际关于理学书籍销售状况的描述和评论相印证，即其时理学在知识界鲜被关注的尴尬境遇，并非夸张之词。此外，通过这些数量不等的理学书籍的刊刻、辑录与撰述，还可以看出在嘉庆后期及道光朝，理学逐渐被知识界关注，出现复兴之势。

五、结语

以上我们在讨论嘉庆前期理学衰微状况的基础上，从学者的意见与观感、国家政策的调整与实施及理学书籍的刊刻与撰述等三方面，讨论了十九世纪上半期理学在知识界由衰微至极到逐渐出现复兴之势的发展过程。

此中最能体现理学“剥极而复”这一发展趋势的，无疑是国家政策的调整与实施。而学者的意见与观感则是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尽管如此，它却能较为真实地体现理学发展的这一复杂过程。至于理学书籍的撰述与刊刻，则不但是这一时期清廷文化政策调整与实施的体现，而拉长历史时段，将不同时期理学书籍的刊刻与撰述状况做对比，则不但将为学者的意见与观感这一较为薄弱的环节提供佐证，同时也更能直观地呈现这一时期理学的发展状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况。

为此，我们选取四库开馆的乾隆三十八年到咸丰二年（1773—1852）的八十年间作为统计对象，以处于中间的嘉庆十八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相等的时段。统计结果表明，后一个四十年间理学书籍的刊刻种类和数量，竟是前一个四十年的3倍左右！这一相差悬殊的数字对比，不但为我们讨论的十九世纪上半期理学在知识界“剥极而复”的发展过程提供了坚实的佐证，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考察乾嘉汉学考据鼎盛时期，亦即四库开馆到天理教事件发生的嘉庆十八年这四十年间理学在知识界的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数据。

至于理学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的状况，则一方面是嘉庆朝前期处于衰微至极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种状态引起少数有识之士的忧虑和关注，并因此出现各种倡导理学的意见。嘉庆十八年发生的天理教事件，恰是一有利契机，它不但导致清廷在文化政策方面作出重大调整，同时也使得民间那些少数倡导理学的意见成为官方的政策和行为。在朝野共同努力下，理学在嘉庆朝后期尤其是道光朝终于逐渐恢复生机。同时，这一过程在理学书籍的刊刻与撰述方面亦有明确体现。

关于清中叶汉学与宋学的消长关系以及道咸以降理学的兴起，学界通常将道光十一年（1831）方东树所撰《汉学商兑》的出版，作为一个标志性或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如王汎森先生就称“像《汉学商兑》这样一本系统而大胆地攻击考证学之书在1831年出现时，不能不说是石破天惊之举了。”[101]通过本文对十九世纪上半期理学状况的讨论，不难发现方氏此书正是嘉庆十八年天理教事件后朝野上下开始重新关注、提倡理学的产物，而其批评汉学考据、提倡理学等诸多言论，亦非方氏本人的孤发之明，而是这一时期知识界几乎成为“意见气候”的学者意见与观感。因而如果要在清中叶汉学与宋学的消长之间，找出一个标志性或最具象征意义的时间或事件的话，那么嘉庆十八年震惊朝野的天理教事件的发生似乎远比道光十一年四卷《汉学商兑》的出版更为合适。

＊本项研究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第三期专项经费的资助，论文承清华大学黄振萍先生、谭红艳博士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①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995—996页，中华书局，1986年。

②余英时《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载氏著《士与中国文化》（新版），579—5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③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53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④参见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4年。

⑤参见［英］弗拉斯卡—斯帕达、贾丁主编，苏贤贵等译《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法］费夫贺、马尔坦著、李鸿志译：《印刷书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⑥如朱维铮《汉学与反汉学》，氏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13—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黄爱平《〈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兼论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4期；李帆《清代理学史》中卷，352—393页，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

⑦夏长朴《乾隆皇帝与汉宋之学》，彭林主编《清代经学与文化》，156—1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派研究》，6—1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⑧柳得恭《燕台再游录》，《燕行录全集》卷六十，265页，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此材料承葛兆光教授检示，特此致谢!

⑨⑲昭梿《啸亭杂录》卷十“书贾语”，317—318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⑩张海珊《记收书目录后》，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二，22—23页，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光绪十二年思补楼重校本。

⑪段玉裁《致刘台拱》，转引自刘文兴《刘端临先生年谱》，62页，（香港）崇文书店，1975年。

⑫段玉裁《与刘端临第二十四书》，刘盼遂编《经韵楼集补编》卷下，15页，来薰阁书店，1936年。

⑬诸联《明斋小识》卷六“春人读书”条，5页，《笔记小说大观》第28册影印“上海进步书局”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

⑭㉓㉛㉝㊵㊻姚鼐《与陈硕士》，《惜抱先生尺牍》卷七，咸丰五年聊城杨氏海源阁刻本。

⑮柳得恭《燕台再游录》，《燕行录全集》卷六十，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70 页。

⑯刘建臻点校 《焦循诗文集》，572 页，扬州：广陵书社，2009 年。

⑰汪喜孙 《与戚蓉台书》，《汪孟慈集》卷五，杨晋龙主编《汪喜孙著作集》(上)，152 页，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 年。

⑱ 陈用光 《费给谏家传》，《太乙舟文集》卷三，页 41，道光癸卯“孝友堂”重刊本。

⑳章学诚 《书朱陆篇后》，叶瑛《文史通义校注》卷三，276 页，中华书局，1985 年。

㉑章学诚 《答邵二云书》，《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 年。

㉒章学诚 《又与朱少白书》，《章学诚遗书》。

㉔参见孟森 《清史讲义》，327—366 页，中华书局，2006 年；张瑞龙 《天理教事件与清中叶文化政策的转变——以嘉庆朝为中心的考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1 期，51—87 页，2011 年 3 月。

㉕陈鸿森 《〈段玉裁年谱〉订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0 本第 3 分，638 页，1989 年。

㉖段玉裁 《娱亲雅言序》，《经韵楼集》卷八，页 12，道光元年刊本。

㉗段玉裁 《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经韵楼集》卷八，页 14—15。

㉘段玉裁 《致陈寿祺》，载《左海经辨》卷首，道光癸未秋刻本。

㉙陈寿祺 《孟氏八录跋》，《左海文集》卷七，三山陈氏家刻《左海全集》本。

㉚阮亨 《瀛舟笔谈》卷七，页 1，嘉庆庚辰刻本。

㉜姚鼐 《安庆府重修儒学记(代)》，《惜抱轩文集后集》卷八，刘季高点校《惜抱轩诗文集》，396—39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㉞张海珊 《与黄北山书》，《小安乐窝文集》卷三，道光辛卯刊本。

㉟张海珊 《与施濂夫书》，《小安乐窝文集》卷三。

㊱方宗诚 《夏先生传》、胡培翚 《徽州府训导夏先生墓志铭》，缪荃孙辑 《续碑传集》卷四十六，页 3；卷七十一，页 6，宣统二年江楚编译局刊本。

㊲张履 《复陈铜士书》，《积石文稿》卷九，光绪甲午刻本。

㊳董桂敷 《豫章书院示诸生》，《自知室文集》卷一，道光甲午序刻本。

㊴姚鼐 《复陈钟溪》，《惜抱先生尺牍》卷五。

㊶夏炯 《答友人论学政》，《夏仲子集》卷六，民国十四年刻本。

㊷夏炯 《读张清恪各种》，《夏仲子集》卷二。

㊸姚鼐 《与陈硕士》，《惜抱先生尺牍》卷七；王钟翰点校 《清史列传》卷三十四《陈用光传》，2676—2677 页，中华书局，1987 年。

㊹姚鼐 《与鲍双五》，《惜抱先生尺牍》卷四。

㊺姚鼐 《与伯昂从侄孙》，《惜抱先生尺牍》卷八。

㊼㊿沈宗涵、沈宗济 《鼎甫府君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136 册，352—354 页，358 页。

㊽沈维鐈 《校刊读书分年日程跋》，《补读书斋遗稿》卷六，光绪二十五年补刻本。

㊾沈维鐈 《湖北试牍序》，《补读书斋遗稿》卷五。

㊿转引自陶澍 《太常寺卿卿公墓表》，《陶文毅公全集》卷四十六，道光二十年两淮淮北士民刻本。

5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 22 册，398—399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清仁宗实录》(五)卷三三五，420—421 页，中华书局，1986 年。

52姚椿 《重刊近思录后记》，《近思录》卷末，道光三年印本；程水龙 《〈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5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53俞恒泽 《重刊小学序》，高愈《小学纂注》卷首，嘉庆二十三年(1818)蜀刻本。

54《明臣刘宗周从祀文庙上谕》，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六册，638—639 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年；并参《清宣宗实录》(一)卷三二，576 页，中华书局，1986 年。

55《清宣宗实录》(一)卷三二，579 页。

56卢浙 《请以汤斌从祀文庙折》、玉麟 《礼部议准以汤斌从祀文庙折》、《准汤斌从祀文庙上谕》，范志亭等辑校《汤斌集》，1864—1867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清宣宗实录》(一)卷四九，868—869 页。

57尚镕 《太仆寺卿卢公家传》，缪荃孙辑 《续碑传集》卷十六。

58《礼部奏请黄道周从祀文庙咨文》，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一末附，页 32—34；《清宣宗实录》(二)卷七八，264 页。

59礼部谨奏为遵旨议奏事、内阁抄出河南巡抚程祖洛等奏请名臣吕坤从祀文庙折及上谕等，吕坤《去伪斋集》卷首，页 1—4，道光丁亥开封府署刻本。

60《孙奇逢从祀文庙上谕》，转引自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六十六《孙奇逢传》，5241 页；《清宣宗实录》(三)卷一三三。

61昆冈等修、刘启端等纂：《(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三六，《续修四库全书》第 804 册，833—836 页。

62《清宣宗实录》(一)卷四九，886—887 页。

63沈维鐈 《凤池书院课艺序》，《补读书斋遗稿》卷五。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⑭沈维鐈 《闽中校士录序》，《补读书斋遗稿》卷五。
⑮㉑陈用光 《勉学堂记》，《太乙舟文集》卷四。
⑯参见先福 《重刻近思录序》、王鼎 《朱子原订近思录序》，均载江永《朱子原订近思录集注》卷首，嘉庆甲戌江西藩署刻本。
⑱董桂敷 《与魏默深书》，《自知室文集》卷一，12页；据李瑚《魏源事迹系年》（增补本），261页，朝华出版社，2002年。
⑲唐鉴 《朝议大夫司经局洗马戚君墓志铭》，缪荃孙辑 《续碑传集》卷十八，页11。
⑳陈用光 《重订读书分年日程序》、《重刻一隅集序》，《太乙舟文集》卷六。
㉒沈宗涵、沈宗济 《鼎甫府君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36册，392—393、397页。
㉓祁寯藻编、祁世长续编 《观斋行年自记》，《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46册，561页。
㉔龙启瑞 《留任告示》，《经德堂文别集》卷下，光绪戊寅刊本。
㉕龙启瑞 《致杜继园书》，《经德堂文集》卷六，光绪四年京师刊本。
㉖莫晋 《刘蕺山先生人谱序》，《来雨轩存稿》卷三，道光丙午刻本；陆成本 《重刊刘蕺山先生人谱类记序》，《人谱》卷首，嘉庆丙子重刻本。
㉗李宗传 《杨园集序》，陈祖武点校 《杨园先生全集》，14—15页，中华书局，2002年。
㉘分别见徐鼎、李文熙、俞恒泽各自所作《重刊小学序》，均载高愈《小学纂注》卷首，嘉庆二十三年蜀刻本。
㉙莫晋 《重刻明儒学案序》，《来雨轩存稿》卷三。
㉚沈维鐈 《汪双池文集序》、《理学逢原序》，《补读书斋遗稿》卷五；卷四。
㉛梁敦怀 《识语》，薛瑄《读书录》卷首，道光七年刻本。
㉜参见上海图书馆编 《中国丛书综录（一）》，511、516、5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阳海清编撰 《中国丛书广录》上册，173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㉝杨春和 《二曲全集皋兰序》、孔昭敬 《皋兰重刻二曲集跋》，分别见《二曲全集》卷首、卷末，咸丰四年甲寅秋月重刊本；完颜恽珠 《重梓李二曲先生全集序》、麟庆 《二曲集跋》，载《李二曲先生全集》卷首、卷末，道光戊子刊本。
㉞王宗炎 《征刻刘子全书启》、《刘子全书校刻姓氏》，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六册，692—693页。
㉟宗稷辰 《沈霞西墓表》，缪荃孙辑 《续碑传集》卷七十八。
㊱陆成本 《重刊刘蕺山先生人谱类记序》，《人谱》卷首，嘉庆丙子重刻本。
㊲陈寿祺 《重编黄漳浦遗集序》，《左海文集》卷六。
㊳程祖洛、杨国桢、栗毓美等 《〈吕子遗书〉序》，均载《吕子遗书》卷首，道光丁亥开封府署刻本；解扬 《治政与事君：吕坤〈实政录〉及其经世思想研究》，6—7、101—102页，三联书店，2011年。
㊴裕泰 《〈新吾粹语〉序》、汪霦原《〈新吾粹语〉跋》，分别见吕坤著、汪霦原重订 《新吾粹语》卷首、卷末。
㊵董桂敷 《再与魏默深书》，《自知室文集》卷一。
㊶宗稷辰 《沈霞西墓表》，缪荃孙辑 《续碑传集》卷七十八。
㊷张履 《生斋全稿·序》，方垌 《生斋全稿》卷首，咸丰七年刻本。
㊸陈沆 《近思录补注》，道光间刻本。
㊹沈维鐈 《续近思录序》，《补读书斋遗稿》卷四；鲍桂星、何鸿器辑《续近思录》，道光甲午年金陵何流春堂刻本。
㊺姚莹 《黄右爰近思录集说序》，《中复堂遗稿》卷一，同治丁卯《中复堂全集》刻本；程水龙 《〈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85—86页。
㊻郑福照 《方仪卫先生年谱》，方东树《仪卫轩文集》附，页6。
㊼沈维鐈 《国朝学案小识序》、曾国藩 《书学案小识后》，分别见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首、卷末，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㊽潘世恩 《正学编》，同治五年潘氏刻本；何桂珍：《续理学正宗》，民国三年《云南丛书》刊本。
㊾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26—27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
㊿所据版本为 《贩书偶记（附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第2次印刷 《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101)王汎森 《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1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